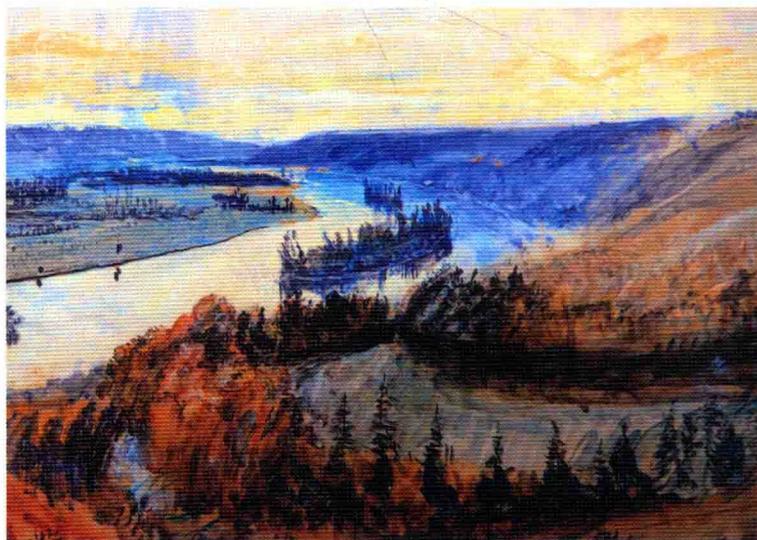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The Anxiety of Taste in
19th 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19世纪
英国文学中的趣味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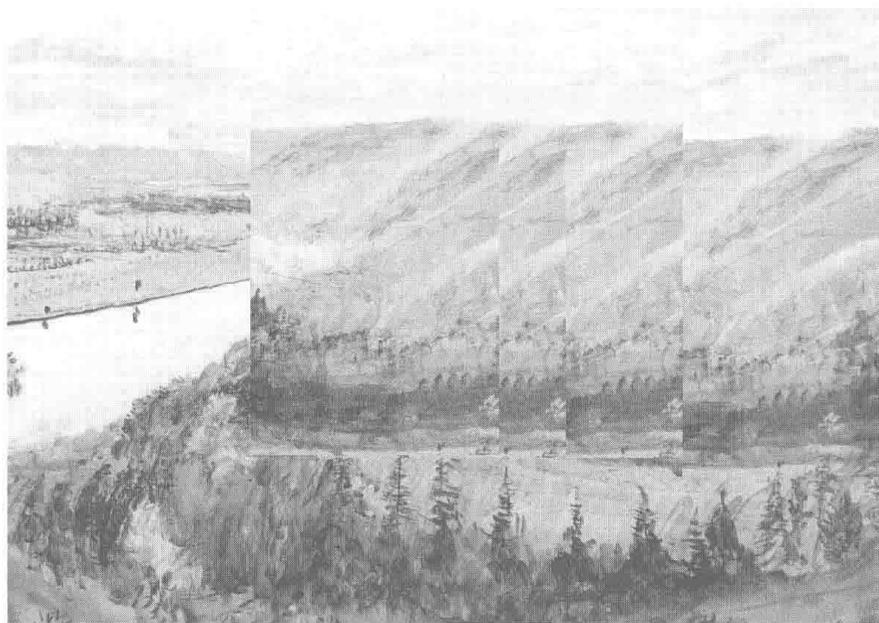
何畅◎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The Anxiety of Taste in
19th 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19世纪
英国文学中的趣味焦虑



何畅◎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趣味焦虑/何畅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203-2985-9

I. ①1… II. ①何… III. ①英国文学—文学史—19世纪
IV. ①I561.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5050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湑
责任校对 姜志菊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160千字
定 价 5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趣味”概念在英国文学中的“前世今生”	(1)
第一节 “趣味”概念在 18 世纪的美学转向	(5)
第二节 “趣味”概念在 19 世纪的文化转向	(15)
第三节 “大众趣味”“日常趣味”与“现代性”	(26)

上篇 私人空间

第一章 《月亮宝石》中的科学趣味	(39)
第一节 不可靠的“感官事实”	(41)
第二节 科学话语	(44)
第三节 科学趣味与中产阶级写作	(48)
第二章 《女王 50 周年大庆》中的阅读趣味	(55)
第一节 阅读的时代与阅读趣味	(56)
第二节 阅读趣味与“文化正确性”	(63)
第三节 “文化正确性”背后的“错位感”	(68)

第三章 《理智与情感》中的“趣味之争”	(73)
第一节 玛丽安的“趣味”观	(74)
第二节 埃莉诺的“趣味”观	(80)
第三节 “口水仗”背后的文化深意	(83)
第四章 《丹尼尔·德隆达》中的音乐趣味	(89)
第一节 “坏”趣味与“好”趣味的冲突	(91)
第二节 “趣味”冲突背后的文化反思	(98)
下篇 公共空间	
第五章 “如画”美学背后的阶级符码	(109)
第一节 “如画美学”与“如画”热潮	(111)
第二节 奥斯丁笔下的“如画”趣味	(115)
第三节 美学批判还是阶级批判	(120)
第六章 “如画”的趣味	
——19世纪英国旅行者笔下的风景	(128)
第一节 “如画”趣味与帝国叙事	(129)
第二节 “如画”趣味与阶级叙事	(138)
第七章 自然的“趣味”与英国19世纪绿色	
公共领域建构	(153)
第一节 绿色公共领域与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	(154)
第二节 湖区保卫运动引发的公众讨论	(159)
第三节 圣乔治社引发的公共实践	(164)

第四节 《19 世纪的暴风雨》引发的公众关注	(169)
第五节 绿色公共领域与中产阶级文化认同	(175)
结语	(182)
参考文献	(189)
后记	(209)

“趣味”概念在英国文学中的 “前世今生”

“趣味”（Taste）一词，不仅是西方美学史中的重要概念，也频繁出现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乃至现代神经学等众多领域。更重要的是，“趣味”理论的发展与文学批评息息相关。正如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所说：“审美趣味是历史经验最精确的测震器。”^①因此，通过聚焦文学作品中有“趣味”的讨论，我们得以了解“趣味”理论背后的社会语境与文化变迁。

如果以英国文学为例，我们不难发现：从18世纪到19世纪，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社会逐渐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正是在这一转型期间，“趣味”理论在文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讨论，18世纪甚至被称为是“趣味”的世纪（the century of

^① Theodor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Trans. E. F. N. Jephcot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p. 145.

taste)。在《鉴赏家》一书中，唐恩先生（Mr. Town）如此评价18世纪英国人对“趣味”的热衷：

目前，“趣味”成了文人雅士追逐的偶像，实际上，它更是被当作所有艺术和科学的精华。淑女和绅士们着装讲究“趣味”；建筑师（无论他是哥特派还是中国园林派）设计讲究“趣味”；画家画画讲究“趣味”；诗人写诗讲究“趣味”；批评家阅读讲究“趣味”。简而言之，小提琴家、钢琴家、歌手、舞者和机械师们，无一不成为“趣味”的子女。然而，在这“趣味”泛滥的时代，却很少有人能说明白究竟是什么是“趣味”，又或者，“趣味”究竟指代的是什么。^①

“趣味”究竟指代什么？为什么“趣味”一词突然成为18、19世纪英国社会的关键词之一？可以说，上述唐恩式的追问始终回响在18、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中，并通过不同的作品、人物得以展现。以英国文学为例，“趣味”理论的变迁至少经历了两次转折，而这两次转折都与英国中产阶级的发展亦步亦趋。尤其在19世纪，“趣味”显然担负起了区分阶级，建构阶级美学景观和文化秩序的重任。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趣味”的阶级区分作用日渐淡化，而“日常趣味”则开始成为文化研究的焦点，并成功地融入许多批评家关于“文化”“大众”，以及“现代性”等核心概念的争论之中。本书以19世纪英国文学为着眼点，旨在说明文学如何以微妙的形式来凸显“趣味”与中

^① Mr. Town, *Critic and Censor-General*, "On Taste", *The Connoisseur*, Ed. George Colman and Bonnell Thomson, Vol. 4, London: R. Baldwin, 1757, pp. 121 - 127.

产阶级文化建构之间的关联。考虑到该话题的复杂性和延续性，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在“绪论”中追述其“前世今生”，从而更敏锐地把握与该词相关的阶级景观与社会景观。

从英语词源来看，“Taste”一词表示“味觉”。在德语中，与“Taste”相对应的是“geschmack”。根据康德的定义，这个词“其本来意义是指某种感官（舌、愕和咽喉）的特点，它是由某些溶解于食物或饮料中的物质以特殊的方式刺激起来的。这个词在使用时既可表示口味的辨别力，也可被理解为合乎口味”^①。有意思的是，由于“味觉”必须来自一物对另一物的物理接触，因此，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在无形中将它与肉欲画上了等号。例如，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规劝“不朽的灵魂”必须远离口腹之欲：

我们这个种族的创造者明白，人类会在饮食方面不节制，会远远超过必要的或恰当的程度大吃大喝。为了不让疾病很快摧毁人类，使我们这个有生灭的种族不至于在没有完成使命的时候就死亡，诸神在作了预见之后就在我们身上安置了所谓的下腹部，作为接受过量饮食的一个容器，还在腹内安装了弯弯曲曲的肠子，以免食物通过太快而使身体马上就需要更多的食物，成为永不满足的婆餐之徒，使整个种族成为哲学和文化的敌人，反叛我们身上最神圣的部分。^②

① [德] 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页。

② [古希腊]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可见，在西方美学发展的初期，“趣味”并不属于美学范畴，而是一个与道德相关的概念。尤其在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形成之前，味觉这一感官体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肉体的放纵与无节制。

追根溯源，上述联想与《创世纪》的影响不无关系。人类的堕落似乎始于夏娃的一口苹果。因此，与“味觉”相关的“Glut”“Gluttony”都成为罪恶、堕落、贪婪的同义词。17世纪初期，《失乐园》开篇即讲到死亡和灾难来自人类“致命的一口（Mortal taste）”。在弥尔顿笔下，夏娃受到了撒旦的诱惑，在梦中预见到自己的逾越之举。她如此说道：“他（夏娃梦中的天使）摘下了果子，他品味了果子（He pluckt, he tasted）。”^①显然，此处的“品味”（taste）带有伦理学的含义。很多评论家，包括诗人雪莱都注意到了这一舌尖上的罪恶^②。雪莱是这样说的：“亚当与夏娃偷食邪恶之树的禁果，致使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上帝的迁怒之下失去了永生的机会。这一寓言恰恰解释了以下论断：不自然的饮食（unnatural diet）必然滋生疾病与罪恶。”^③可见，“品味”（taste）意味着一种十足的伦理学困境。更重要的是，夏娃的这一口开启了她的自我探索之旅。丹尼斯·吉甘特（Denise Gigante）

^① John Milton, *Complete Poems and Major Prose*, ed. Merritt Y. Hughes, New York: Odyssey, 1957, pp. 302 - 303.

^② 雪莱对于“不自然”的饮食的关注和他的素食主义背景有关。和大部分十七世纪的素食主义者一样，雪莱认为“食肉”是一种不自然的堕落的饮食选择。因此，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得像基督教神学家一样，将“品尝”与道德的罪恶相关联。此外，17世纪的主流饮食观还将未煮熟的生果列为“不自然”的饮食。正是在上述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才有了下文中雪莱关于“不自然”的饮食的论断。详见 Denise Gigante, *Taste: a Literary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4.

^③ Percy Shelly, *Shelley's Prose; or the Trumpet of a Prophecy*, Ed. David Lee Clark, London: Fourth Estate, 1988, p. 24.

指出，“弥尔顿挑战了‘taste’一词本身的本体论诗学力量（the onto-poetic power）。应该说，从弥尔顿开始，‘taste’不仅仅表示主体的辨别行为，它更是主体的构成要素。”^①换言之，对自我的探索开始成为“趣味”概念的另一层含义，并预示着这一概念在18世纪的美学转向。

第一节 “趣味”概念在18世纪的美学转向

虽然18世纪被认为是理性的世纪，但“理性的人”显然只是故事的一半。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认为，“自我这一社会建构（物）”取决于人如何处理由感官获得的经验（the social construct of selfhood dependent on how human beings process Experiences through Senses）^②。上述感官经验自然包括了味觉体验。随着18世纪经验主义哲学的发展，沙夫茨伯里伯爵（Shaftsbury）、休谟（Hume）、伯克（Burke）等人一再将“趣味”概念与“美”的概念并置而论，从而将“趣味”发展成为经验主义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事实上，经验主义美学在18世纪英国的盛行绝非积句来巢，空穴来风。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美学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正是在18世纪这个特殊的时期，随着早期中产阶层的出现，各种美学概念开始出现在英国这个阶级

^① Denise Gigante, *Taste: A Literary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4.

^② 关于此观点，详见 John Lock,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结构中，并不声色地起着非同寻常的核心作用。”^① 在随后几个世纪中，美学一直在英国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的重要性在于“当它讨论艺术时，它实际上在讨论其他事情，而这些事情恰恰关乎中产阶级政治霸权（领导权）的核心问题”^②。无独有偶，如果我们追述“美学”（Aesthetics）一词的希腊语词源，就会发现：

在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加登（Alexander Baumgarten）所做的最初的阐释里，这个术语首先指的不是艺术，而是如同其希腊语词源（aisthesis）所表达的一样，表示人类的全部感知（perception）与感受领域（sensation），与精妙深奥的概念思想领域形成鲜明的对照。^③

可见，美学本身即有关感官的话语。作为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之一，“趣味”被囊括在美学的范畴之内，并随着经验主义美学在18世纪的盛行完成了其美学转向。

如果说经验主义美学在英国的发展与中产阶级的崛起密切相关，那么，“趣味”理论的“美学转向”亦与后者脱不了干系。我们知道，从18世纪开始，对自我的探索就是中产阶级主体建构的核心问题。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在18世纪经验主义美学中，“趣味”概念始终代表着一种从表及里的探索过程，即从品尝外部世界开始，由此形成个体经验，从而产生“趣味”判断。例

① 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0, p. 4.

② Ibid., p. 3.

③ Ibid., p. 13.

如，沙夫茨伯里伯爵曾指出，“趣味”始终与“自我”有关，“正是我们自己创造并形成属于我们的趣味。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是否想形成一个正确的趣味”^①。在《独白，或给一位作家的建议》（“Soliloquy, or advice to and author”）一文中，沙夫茨伯里伯爵多次将作家的“趣味”暗示为一种自我形塑（self-making）的哲学，是个体的人“摒弃一切杂质”（method of evacuation）的过程^②。

此处，“摒弃杂质”（evacuation）一词折射了18世纪生理学关于肠胃功能研究的发展，也让人联想起“趣味”的本义：品尝。可见，从18世纪开始，“趣味”一词实现了由表及里的蜕变，即从“品尝”美味佳肴之义延伸为表示“摒弃”文化中的粗糙、未成熟之物（crudities），从而形成正确的趣味判断之义。确切地说，自此开始，“趣味”（taste）一词与主体所可能获得的“心智培养”（cultivation）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沙夫茨伯里伯爵关于“趣味”的可塑性这一观点在无形中为中产阶级的社会提升打开了大门。例如，在《道德家们》（“The Moralist”）一文中，沙氏将“趣味”划分为三种类型：坏的趣味，即“做作的”（artificial）趣味；好的趣味，即“合宜的”（well-formed）趣味；以及两者之间的趣味，“自然的”趣味^③。“自然的”趣味如果得以栽培，则发展成为“合宜的”

① Anthony Ashley Cooper, *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ed. Lawrence E. Klei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9, p. 417.

② Ibid., p. 74.

③ 此处的“自然”的趣味指“天生”的趣味，取决于内在器官的感受力。沙夫茨伯里认为，“人天生就有审辨善恶、美丑的能力，这种审辨美的特殊感官就是‘内在的眼睛’，它根植于人性中，是人的心灵的一种能力。”详见[英]沙夫茨伯里《论特征：道德家们》，载《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5页。

趣味；反之，则流为“做作的”趣味^①。随后，在《人、风俗、意见与时代之特征》一文中，他再次强调：“一个合法的、正确的趣味的获得、形成、孕育或者产生都离不开之前的努力和批评的阵痛（A legitimate and just taste can neither be begotten, made, conceived or produced without the antecedent labour and pains of criticism）。”^②可见，沙氏认为，“合宜的”趣味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外界的修正获得，即“趣味”可以后天形成。

沙氏的这一观点对哈奇森、休谟、伯克的“趣味”观都有极大影响。例如：在哈奇生看来，“教育和习俗会影响我们的内在感官……可以提高人心记忆、比较复杂结构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之下，面对最美的东西，我们所感受到的快感就远远高于通常的情况。”^③休谟的“趣味观”显然与沙氏和哈奇生一脉相承。在《论趣味与激情的敏感性》（“Of the Delicacy of Taste and Passion”）一文中，他指出激情的敏感不同于趣味的敏感，而矫正“激情的敏感”是“培养更高级、更雅致的趣味”的第一要义^④。因此，良好的“趣味”必须“在实践中提高，在比较中完善”^⑤。可以说，“矫正”、“实践”、“比较”这几个词充分暗示了“趣味”的后天可塑性。与前面三位经验主义美学家相比，伯克的“趣味观”则显得更为激进。他完全割裂了“趣味”与内在器官

① [英]沙夫茨伯里：《论特征：道德家们》，载《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5页。

② Anthony Ashley Cooper, *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ed. Lawrence E. Klei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9, p. 408.

③ [英]哈奇生：《论美与德行两个概念的根源》，载《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0页。

④ [英]大卫·休谟：《论道德与文学》，马万利、张正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⑤ 同上书，第107页。

的关联，并指出“趣味”来自以下三要素：感觉、想象力和理性判断^①。显然，这三要素的形成与“教育”和“习俗”相关，也与“矫正”、“实践”、“比较”不无关系，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心智培育”得以提高。此外，在《论趣味》一文中，他直言不讳地将产生错误“趣味”的原因归咎为“缺乏恰当的、有良好指导的训练”，并且指出“单单这种训练就可以增强和完善判断力”^②。试想，既然“趣味”得益于后天的心智培育，那么，中产阶级群体为何不通过“审美趣味”的培养来提升文化身份呢？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趣味”理论从18世纪开始就似乎与中产阶级文化建立起了某种亲缘关系。更重要的是，在18世纪经验主义美学家们对“趣味”的讨论中，“趣味”不仅关乎个人，而且与社会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对莎夫茨伯利来说，良好“趣味”的培养能有效实现“利己”与“利他”的双赢，因为任何个体都是社会的一部分，个体只有通过主动与他人建立积极地联系才能算是一个“有趣味的人”（Man of Taste）。因此，沙氏的“有趣味的人”必须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帮助他人形成良好趣味的道德责任^③。换句话说，他们不再是感官之味（to taste）的被动承受者和消费者，相反，他们成为“趣味”的创造者和生产者。华兹华斯在1815年写过一段关于“趣味”的名言，非常生动地描述了上述从被动转为主动的过程：“趣味，它所涉及的范围早已被迫超过了原本的哲学范畴。作为一个隐喻，它来自人类身体的被动感

① [英] 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郭飞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② 同上。

③ Denise Gigante, *Taste: A Literary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2.

知，然后其意义转变为表示在本质上完全不被动的事物，例如‘智识行为’（Taste, ...is a word which has been forced to extend its service far beyond the point to which philosophy would have confined. It is a metaphor, taken from a passive sense of the human body, and transferred to things which are in their essence not passive, -to intellectual acts and operations).”^① 不难看出，上述语义转变折射了中产阶级个体希望通过自主创作，实现群体发展的心理诉求。

事实上，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对立与融合，个体发展与群体发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直让英国中产阶级成员倍感焦虑。正如伊格尔顿指出的那样，虽然新兴的中产阶级成员信心百倍地把自己定义为自由的，普遍的主体，但他们始终焦虑地意识到：他们追捧的个人主义过于琐碎与务实，是一种粗鲁的个人主义。“粗鲁”一词的原文为 ROBUST，虽有茁壮之意，却一语双关，道出了个人主义的致命缺陷：即只顾个人，不顾他者；只顾个体，不顾总体。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审美的介入是化解上述矛盾的有效手段。用他的话来说，审美是一个“和解之梦”，“梦想每一个个体能在无损个性的前提下交织成为亲密的总体，而在抽象的总体中则洋溢着真切实在的个体生命”^②。

从以沙氏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美学家们关于“趣味”的阐释来看，他们都做着同样的“和解之梦”。除去沙氏外，休谟在《趣味的标准》一文中也提出：“寻求一种趣味的标准是很自然的，

^① Wordsworth, “Essay, Supplementary to the Preface” (1815), qtd. in Denise Gigante, *Taste: A Literary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68.

^② 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0, p. 25.

它是一种能够协调人们各种不同情感的原则。”^① 此外，他强调：一个批评家要进行良好的趣味判断，就必须“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如果可能的话，要忘记自己的存在以及具体的环境”^②。可见，在休谟这里，“忘我”是协调与他人情感的前提，也是实现趣味判断的必要手段。与沙氏、休谟形成呼应的是伯克关于“趣味”的定义。《论趣味》一文是《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一书的序言。在该文中，伯克指出：“趣味”来自于“对感官初级感觉、想象力的次级感觉以及理性能力所得结论的整体把握”，更重要的是，它与“人类的激情、习惯和行为方式”密切相关^③。在随后的文章中，伯克又指出人类的激情大体分为两种：惊恐、害怕等涉及个体自保的激情，以及温柔、爱恋等涉及社会交往的激情^④，前者与“崇高”相对应，后者与“美”相对应。换句话说，伯克的“趣味”观兼顾“个人”与“社会”，既是“崇高”的，又是“美”的。

显然，在18世纪经验主义美学家关于“趣味”的论述中，主体的感官经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与此同时，强烈的他人意识让“趣味”判断在成为美学判断的同时，又不失为一个伦理判断。从这一点来看，“趣味”理论脱胎于伦理学范畴，成熟于伦理学之外，却始终与人作为伦理个体的成长息息相关。值得注

① [英] 大卫·休谟：《论道德与文学》，马万利、张正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

② 同上书，第105页。

③ [英] 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郭飞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④ 同上书，第35页。